

今日評論

期五第十 卷四第

這一週

我們需要的政治制度

國防工業的建設

物價和農村變遷

對於各級農業教育之管見

香港的文藝界（香港通訊）

錢端升

吳之椿

趙晚屏

曾省

馬耳

版出日三十月十年九十二國民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這一週

雙十節紀念今年已經二十九週年了。古語說，「三十而立」，這是人到了三十之年，就可卓然自立。國家的壽命無疆無窮，二十九年的歷史真正還是嬰兒。然而環顧我們中華民國的目前狀況，却亦够得上「卓然自立」這四個字的資格了。我們敢相信，中華民國三十年的時候，抗戰必有了最後的勝利，而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的民族革命必有了最後的成功。中華民族自誕生及至二十九週歲，經過無數風波，受盡無量艱辛。今日還依然在驚濤險浪中。然而我們相信，中華民國的前途，後此往放光明。中華民國的生命是萬壽無疆。我們常想，人類史上為民主，為自由平等而革命，革命而且成功的紀念日期有三：以法國的「七，一四」，美國的「七，四」，及中華民國的「雙十」。這三個紀念日期中，「七，一四」在今日已黯然無光。撫今追昔，我們對今日的法蘭西民族，感懷萬端。中華民族正在堅苦奮鬥，以發揚光大「雙十」革命精神。自德意日三角同盟成立後，美國亦成了反民主主義者損失之的。今後民主主義在人類史中的命運，惟中美兩國是賴了。我們又絕對相信，中國必能本「雙十」精神，美國必能本「七，四」精神，攜手並進，以護衛民主主義，使民主主義有永遠的勝利！

最近一週來，日寇在空襲方面比較猖獗。重慶與成都最近常有敵機大規模侵襲的消息。雲南省則自日寇在海防登陸以後，幾無日無空襲警報。日寇這種舉動，其實容易解釋。日寇急於求中日事件之結束，苦於無法達此目的，於是以飛機四處襲擾，以求動搖我抗戰精神。應付敵人此種鬼蜮伎倆，亦十分容易。對敵人此種襲擾，我們國民處之以鎮靜安定。不止我們抗戰精神，不為之絲毫動搖，即我們國民一切日常工作，在此時期更為之振作奮發，加倍努力進行。敵人轟炸我們的城市，我們還鄉村工作。敵人白晝來襲

擾，我們夜間工作，敵人愈擾亂，我們愈鎮靜；敵機愈轟炸，我們愈安定。「工作！工作！工作！」這是我們應付敵人的口號。日寇所破壞的抵不過我們的建設。日寇誇耀之技擊突上今日的大轟炸，這是日寇的最後掙扎。我們用「努力工作」四字戰敗之，我們的前途就日見光明了！

中央設計局，據重慶電訊，已於十月一日正式成立。設計局的設立，其目的在將中央各機關之設計部份完全集中統一。這種設施，我們絕端贊成。以往中央非缺乏設計機關，其弊在設計機關林立。一部，一局，一署，一委員會各有其設計機關。於是機關的精力時間，多費於研究討論上。各項計劃，日日在各衙門中循環轉圈，環游既畢，則計劃依然是計劃，還是以往行政效率低落的癥結。重大毛病，因為設計機關太多，結果是各自為計。設計局成立以後，以往這些毛病，我們希堅能够徹底革除。今日中國行政上的毛病，一方面固在各自為計，另一方面却在重言而不重行。設計局成立以後，各自為計一層，當可避免。至於重言而不重行一點如何避免，依然是大問題。倘我們為設計局借箸一籌，則今日設計局的重大責任，即在草擬一計劃，使中國行政機構，簡單化，系統化，合理化，而成為真正做事機關。倘能做到這點，則設計局設此一計，已貢獻於國家者無算矣！設計局成立伊始，謹賀數言，以資鼓勵，並祝成功！

滇緬鐵路開放，據最近情勢看來，已不成問題。開放滇緬鐵路事，與其說是中國抗戰之成功，或英國輿論要求的成功，毋寧說是三角同盟的反響。據最近倫敦消息，邱吉爾首相正將開放滇緬路事與美蘇政府商討中。這點，在邱吉爾又是多此一舉。美國反對滇緬路停運，已一再有所表示。蘇聯則以為以物資接濟中國數量最多的友邦。蘇聯當然反對滇緬路停運。事到今日，英國

即放過鐵路。歷絕無思慮疑討論的餘地。徹底說些，滇緬路停運三月，這是英國政策上的大錯特錯。日寇與英國權益作對，何待三國聯盟成立，始能看出。英國政府畏首畏尾，始終希望協和政策可以苟全，此實英國人之一誤。再誤耳！事到今日，我們以為英國應不待十月十八始將滇緬路開放。滇緬路早開放一日，中國多有一日便利，而英國亦多有一日實利。日寇豈配談條約之信義？三角同盟成立以後，英國尤復謹守滇緬路三月停運之約，邱吉爾亦可謂迂矣！

英國內閣再度改組，張伯倫退出內閣，英國政治上這種變更早在我們意料之中。英國今日成這局面，整個國際今日成此局面，張伯倫雖不能完全負此責任，然此人之責任的確不小。英國是輿論對張伯倫的協和政策深惡痛絕。張伯倫終必出閣下台，事所必然。張伯倫下台，其政治生涯必從此永遠告一結束。張伯倫的協和政策，在歐洲在遠東的協和政策，與張伯倫政治生涯同時告一結束，這是英國國民的希望，這亦是我們的希望。

希 羅拔里尼最近在勃倫納曾經舉行一次會談，會談之內幕究竟如何，外間無從得知。據外間傳說，希羅納談者係及英的全盤計劃。德與攻倫敦，意圖攻埃及，這是主要內容。事實是否如此，尙待證明。以我們臆測，希羅所談者或不以此。其談話內容，必涉及遠東，必涉及美國。更必涉及三國同盟條約成立後其他秘密附件。三國同盟中的日寇，本不過俯首聽命的地位。今後日寇應如何受德意的指揮，應如何聽從希羅兩氏的命令，應在太平洋中執行何種動務，極都在談話內容之列。從今後日寇之行動中，當亦可偵知勃倫納談話多少內容。

倭首相近與倭外相松岡最近向美國發表露骨挑釁的談話，這的確是國際局勢中很可注意的事。松岡說：「余茲以此言向美挑釁，荷美國躊躇滿志之餘，仍一味盲目行事，堅持維持太平洋，現狀，則唯有一戰而已。」近衛說：「美國如繼續拒絕對日本在遠東之地位表示適當之了解與同情……則兩方戰爭外無他道可循。」日寇真是何等猖獗，何等狂放！近三年來，日寇

策威脅英法，綽號美國。以往美國在遠東態度雖堅強，日寇始終出之以隱忍。但自三國同盟成立後，日寇態度突變。對美國叫打之聲，居然不絕於耳。日寇儼然市井流氓，如今有了德意撐腰，居然耀武揚威。卑鄙情形，令人作嘔！日寇誇言三個月戰敗中國，今已三年有餘，自身已是力竭氣衰，今日欲與美國一較優劣，行見其不自量耳！日寇之人力財力，海軍力，空軍力，恐那一樣可與美國一較優劣？德意任歐洲自顧已不暇，又有何力以出援日寇？然則日寇政府人物，何以如此瘋狂？日寇速窮，愈倒行而逆施。日寇之謂歟！

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本月五日的談話，實際必已給予德意日三同盟一嚴重打擊。三國同盟，其作用在對付美國，雖三尺童子，都能明瞭。德意日三角同盟，真正作用，尙在嚇退美國參加歐戰，或在遠東阻止日寇南進。強盜結夥打劫，故意揚言，「有人幫同輯盜，禍必及身。」這是三角同盟的用意。諾克斯對這種恐嚇的答覆是：「國際強盜之勝利，即美國之滅亡也」。又說：「美國人之性格，與極權國家所想像者不同，苟吾人受強力之壓迫，必隨時予以抵抗。」諾克斯這種談話，必出德意日三國意料之外。中國有句諺語，「吃軟不吃硬」，這的確是美國人的性格，德意日忽略了這一點。三國同盟所得的結果，必與其所希望者相反，即希望嚇退美國不參戰者，適以激動美國參戰。因此三國同盟是弄巧成拙。「國際強盜之勝利，即美國之滅亡」，這點我們又認是諾克斯的真知灼見！德意日宰割歐亞二洲以後，彼時美國雖擁門羅主義以求孤立，其可得耶？從諾克斯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有參戰的決心與準備。全世界大戰的展開，恐止是時間問題而已！

丁信先生於本月五日逝世，本刊同人，深為慟悼，丁信先生係清華畢業生。清華派送留美，研究經濟學。回國後在天津南開大學商學院任教授。南開南遷，與清華北大合組西南聯合大學，丁信先生即任聯大商學系主任。同時負責南開研究所及其他機關的研究責任。本刊創辦時，丁信先生亦為發起人之一。本刊出版以來，一切會計事務，均由丁信先生負責主持。丁信先生對人誠篤，對事勤敏，對學問則誠篤勤敏兼而有之。年正富，力正強，丁信先生學問事業前途，正無限量。今不幸逝世，同人失一敬愛之友，國家在學術上失一英才。謹誌哀語，敬表哀悼！

我們需要的政治制度

錢端升

我們需要何種政治制度。這個問題是決不能以主觀的態度來作答。你可用完全主觀的態度來表明你所喜歡的政治制度，但是你不能憑主觀來解決國家的需要。國家的需要是一種客觀的事實，無所用其主觀。

如果單憑主觀，則你有你的理想制度，他也有他的理想制度。如果你是一個所謂「客觀」的學者；你一定感覺到君主與科學的混合制度是理想極了。這裏，聖火在上，而野無遺賢，三代之盛，與夫唐宋之治，俱可指日而幾。如果你是一個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式的政客，則英國式的議會政府制度是你的最高理想。這裏，個人有自由，少數有保障，社會進步而從不須流血。安定而不至於反動。如果你是一個迷信某一種族或某一主義的瘋狂專家，則極權制度是你唯一無二的法寶，這裏，你可以集中一切力量，來將其他的種族壓倒，或是將其他的主義誅除，庶幾你的種族或是你的主義可以獨尊。

但是，你的主觀的好惡與國家的需要毫無相干。你所認爲理想或者是不宜於中國，或者是不施行於中國，要一種制度能合乎中國目前的需要，下述三個條件必要具備：第一，要能担負起國家今後的工作與責任；第二，要有實行的可能；第三，要合乎民族性而可以久長。不合第一個條件則不能顧及國家民族的利益。不合第二個條件是等於空談。不合第三個條件，則國家的秩序將欠安定。

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政制決不是舊式官僚政客所半把握半放任的政制，因爲這種政制決不能負起抗戰建國的大任。也決不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因爲這種政制既不易實現，也不能負起抗戰建國的重任。更不是極權制度，因爲極權政制能助我們抗戰，決不能助我們建設我們心目中所企望的新國家。而且極權政制，即在德義等國，也決不能永久。

我國今日需要一個擁有大權力，而且能發揮大效率的政府。只有這樣一

個政府才擔負得起抗戰建國的各種偉大工作。但這個政府也須能尊重各個人的人格與尊嚴，並能容許各個人對於人生及社會重大問題有懷疑論難之權。我們不能不承認純粹一點的極權政府擁有極大權力。這樣的政府有時也能發揮高度的效率。但極權政府只能有大力去侵略旁人，去欺凌旁人，而不能和平的建國。爲什麼呢？因爲極權主義親視人民的人格與尊嚴。在極權主義之下，人民僅是工具，人民僅有工作而無主張。當政的人固然可以國家民族的大帽子來自翻，說他們的國家如何如何的繁榮強盛，他們的人民如何如何的滿足快樂；但實際上他們的國家必定顯着瘋狂道上邁進，而他們的人民不是瘋狂的殉難，定爲瘋狂的犧牲品。所以極權國家好比是曇花，一現之後，便是破滅。在一現的時候，國家儘可以很強，但人民必定沒有福利可言。一現之後，則國家人民兩歸於盡。凡是政府的強有力者，一定也得有折得住挺得出的人民爲輔，國運才能永昌。

總看起來，要政府有大權，又要政府能尊重人民的人格與尊嚴，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實則孫中山先生早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如細考孫先生關於政制的許多理論，而不加以主觀的曲解，則可發現孫先生實早因這困難問題而有過一番思索與研討。思索與研討的結果指出了一個新的途徑。這途徑就是民權主義。他的民權主義實是一條經過大努力後可以走得通的康莊大道。他的民權主義曾遭受過兩大不幸：一是解釋者的失當，二是實行者的乏力。向來解釋民權主義者不是戴了英美民治制度的有色眼鏡，硬把他當做英美式的民治，便是絲毫不懂法律政治，不懂中外政制的演變，不理會孫先生所要解決的難題，而將孫先生暢達的理論死板板地地下了一些無可咀嚙更無可欣賞的註解。前者是二毛子派，其說容或通，而決非孫先生的原意。後者是黨之股派，其用意或尚忠實，但其說則絕不通。兩者均非孫先生的罪人。依常

論的解釋，孫先生之所指示者乃是如下的一套理論：先由國民黨訓練人民能行使政權。這政權包含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者，但最重要者當然是選舉。換言之，舉行孫先生遺教者應知選舉權的重要，却不必拘泥於四權之同時行使。人民能行使政權後，人民得藉國民大會以表示其主人翁的地位，但治理之權則操於政府。政府須有極完全的治理權：人民固可以表示不信任政府，但在平時，則人民不能時時加以牽制，致使政府因慮上發生困難。治權固然有五，但行政機關因與人民接觸最多，且推行政令之權也在其手中，故行政機關自當獨大。再概括言之，我們如忠實地奉行孫先生的遺教，我們的政府應是握有大權的，政府所有之權原不必遜於極權政府所有者。但因政權在民，且有國民大會的存在，故人民的地位又不必低於人民在英美民治國家所享的地位。換一句話，孫先生所企求者實是一種兼有各政制之長的政制。孫先生要提倡他所提倡的政制，因為一方他醉心於歐美的民治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建立一個可以有力提高民族地位，也可以有力實行實業計劃的政府，這兩種目標我們全要注意到，否則我們不易理解孫先生的主張。

孫先生關於政制的主張是十分適合於中國的國情。無如除了解釋者的失當外，北伐統一後的國民黨當局又未充分具有實行並完成訓政的力量，以致中國的政制限入了不上不下可左可右的狀態。到了如今，要回到建國大綱所定關於軍政訓政政政的步驟，事實上已不可能。在抗戰的局面之下，我們不能窺板的將國民黨訓政之事再從頭演來。但反過來，我們一點不做預備工作遽而立起憲來更是不妥。這層孫先生在建國大綱序文中已慨乎言之，政府去年決定於今年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最近又宣告延緩。這事正可為輕易談不得憲政的一證。孫先生的思想深見解遠，故其主張可以歷久而不失其適宜性。但論到實行的方法，則我們不能不承認十五年的治變。十五年來，尤其是最近三年來，國事的沿變，迫使我們對訓政進至憲政的步驟不能不更加考慮。

√第一個事實我們得承認的就是蔣介石先生是全國共戴的有力領袖。第二

個事實是蔣先生是國民黨的總裁，離開了國民黨蔣先生便不是我們今日所知的蔣先生。第一個事實無人承認，第二個事實却不是一般國人的見解。國中今日有甚多擁蔣而反國民黨，譽蔣而毀國民黨者。更有許多善於投機者流以為蔣不可不擁，而國民黨却該拆罵。這一種誤解是建立合理政制的最大障害。這一種誤解一日不消滅，則合理政制一日不能建立。患這一種誤解病者，如能細考蔣先生十五年的言行，一定可發現中國政治領袖蔣先生與國民黨領袖蔣先生是決然分不開的。

所以在國民大會未能成立，憲政未能實施以前，我以為最合宜的政制是由國民授國民黨總裁蔣先生以全權處理政治。蔣先生於受權之後，則立須完成二件大事：一改組國民黨，加強黨的實力與作用，使能一面負起訓政大任，一面在最近若干年內擔任抗建工作；二成立一個輔佐的民意機關。使蔣先生自己永無或為獨裁者的危險。在形式上這樣的一個政府與極權政府相似；但在精神上則他與極權政府絕不相同，因為領導此政府的蔣先是篤信民權主義者。

國民授權之事可有若干種方式。或由政府召集國民大會，由大會決議授權或由國內各界自動主張。國人對此事如沒有他項意旨，即避免授權的形式，而認為已經授權，亦無不可。

改組黨的目的在吸收一切篤信三民主義而又有為之人。有好黨以便有好黨；才智之人盡在黨中，則黨亦必有力。前年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設立本含徹底更新之意，但其成就僅多了一種與各級黨部並行的組織。黨中人當不能以此而自滿？篤信三民主義而仍立黨外者，為國家計，似更有入黨以強黨的義務。蓋黨的人材如不富，黨的力量如不宏，則訓政工作決難入手，而最近數年的抗建工作也決難勝任。

依西洋的說法，委任的機關本不能盡代表民意的責任。但我之所以主張蔣先生設一輔佐機關者，乃因我國即在君主時代亦嘗有直言極諫的良好傳習。蔣先生不難用委任的方式，成立一個對於規勸建議的有力民意機關。惟過

去的參政會似尙未足以語此。無論其地位或其份子似俱未够分量。

至於黨態如何改組，輔佐的民意機關應如何成立，則均可委請蔣先生，以表示國民授權之實，與蔣先生責任之專。

蔣先生如誠能有此權，而又輔佐得人，同時再加注重法治精神及民治精神，則五年或十年而後，真正的民權或不難實現於中國。制度的適用本

國防工業的建設

無險防者不能有國家，無工業者不能有國防；經過三年抗戰的慘痛經驗與一年歐戰的事實證明，我們對於這兩個命題的真實性應該已有普遍深刻的認識，不再有絲毫的遊移與懷疑了。時至今日，激烈澈底的改革在中國已無可避免；而國防工業的建設便是幾件極重要的改革事業中的一件。

不幸的很，以前討論中國工業建設的文章往往偏重於所謂中國工業化的問題，就是如何使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說得更極端一點就是全盤工業化；這是相信工業國在一切必優於農業國的人們的說法，持反對意見的也不乏其人；他們也有他們的理由。所謂中國工業化，這樣的名詞也對，也不對，但至少是在擬題的文字上一個結構的錯誤，以致發生思想上的混淆與討論上的糾紛。我們知道，一個問題若是在結構上擬對了，解決問題的時候可以減少許多的困難。中國許多年以來討論工業建設所以未能造成有力的一致的輿論，並缺乏因此種輿論而生的有效行動與結果，起首就吃虧在濫用工業化這個名詞而不加以說明。工業化這個名詞，意義的深淺頗欠明瞭；一分是工業化，百分亦是工業化，而所謂一分或百分究竟是用甚麼單位作標準亦必須先行指明纔可比較。事實上，世界沒有完全工業化的國家，也很少完全農業化的國家。但英，美是工業國，中國，印度是農業國，却是公認的事實；這自然不是說英，美沒有人耕田，中國，印度沒有人開工廠，問題仍然繫於工業化的深淺，達到了甚麼程度。人類需要工業，也需要農業；因為人類的營

繫於人。如善用之則成功，如不善用之，則失敗，上述的制度當然也可以失敗。但採上述的制度，而仍不能助我們實現民權主義，則果如何而能實現民權主義呢？政治制度如不以孫先生的民權主義為基礎，則國家今後的工作與責任誰又能勝任呢？我深願國人能以極客觀的態度共同討論這個重要問題。

吳之椿

養，直接間接的離不開植物，大多數人類的營養幾乎全靠植物，所以全盤工業化一類的話調，簡直不成爲名詞。

中國工業化的討論，歷來犯着幾個毛病；昧於本國的歷史，昧於別國的歷史，不知世界的現狀，不知本國的需要。中國本是農業國，有史已五千年，史前更不知若干千年。以如此悠久的農業經濟基礎欲於旦夕之間使之變成工業國，起碼的批評是不可能。蘇聯經過幾次的五年計劃，工業雖有了基礎，但蘇聯今日還是農業國；再加上幾次的五年計劃，也不一定就能變成工業國，這是一個當前的證明。如果我們將眼界放寬，參看西歐工業革命的歷史，我們的論斷可以得着更有力的根據。西歐工業革命的歷史，若從一七六〇年算起，至今快近二百年；若追溯其源到文藝與科學之復興，那就更久了。西歐工業的發展因素甚多，有在國內的，有在國外的；有屬於歷史的，有屬於偶然的；有由於政策的，有由於幸運的。在其富有曲折的發展歷史之中，此種種因素在各時期的影響不盡一樣；但間接的，偶然的，幸運的因素，其有力不在其他因素之下。具體的說，原料，技術，國內外的市場，世界的物資，金銀的產出。廣大殖民地與未開發的區域之存在，國家之經濟，金融，關稅政策，國際戰爭等因素，皆曾經對於西歐，北美，東亞之工業發展起過不同的勞績。這些經驗多少可供未開發的國家如中國，蘇聯，印度以參考，但並不會指示這些國家在發展工業上所應取的目標與方針，決定這目標與方

針乃是每個國家在其所處時代及環境中的需要。因此，中國在現在的時代與國際環境之下振興工業，所應採的目標與方針必然不同於在一八五〇年，甚或一九〇〇年。舉一個例子以資證明，英國的工業是以煤鐵棉織業的；英國所以能够如此，一大部份的原因是因爲英國得風氣之先，創業較早，佔了便宜，大陸的國家許久不能與之競爭市場。中國亦曾有人致力於棉織救國的事業，但因時代晚了幾十年，不但國外無中國棉織之市場，即國內之市場亦久已操握在外人的手中，所以中國棉織救國事業是失敗了。從這一類的事實，我們可以斷定，凡百事業，縱使自己不講目標，不顧目標，不知目標，僅求依據別國的成規，摹仿別國的成例，也決不能達到別國的成功。工業建設不是例外。中國以往之工業建設，從李鴻章之「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計」起，以至後來之種種的失敗，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此。幾十年來中國工業建設，如果將縮絀浮泛的圖富強當作目標，則中國之未富，未強，又爲盡人週知之事。這種失敗當然不限於中國，也不限於中國之工業。

比較具體的說，從各國工業發展的歷史看，可以看出各國興辦工業的結果有三，一是涉及民生，普遍的提高生活標準，解決人口壓迫的問題；二是厚儲戰爭的經濟力；三是建立國防；這三者也可以有相互的關係。關於民生問題的解決，工業是根本的方法，可以減少人口的壓迫，解決因人口過多而團成的貧乏，內亂等社會問題。近代的國家不患庶與貧而患無工業；「德國在工業化以前的一個時期，人口之增加雖緩，但已有因人口過多的徵兆，因爲鄉村擁擠且有向外移民情形……工業化加速以後，人口大增，但人口過多的徵兆反而消逝，德國成爲進口移民的國家」(Carr-Saunders: World Population 1933, P. 323)。我們從各國的近代經濟發展看，可以說振興工業是中國民生問題的康莊大道。工業發展在別國對於利濟民生，是利害參半的，中國行之如得其道未嘗不可以去其害而取其利。關於藉工業的發展以厚儲戰爭經濟力，這是晚近戰爭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在歐洲自工業發達以後，此種因素的力量，已日益顯著。遠在十九世紀的初年英國以一國的力量，抵禦全歐

的封鎖，獨力支持其本國並接濟友邦與法國戰爭。這個時候英國已經是歐洲工業的領袖，憑藉其多年優勢的工業能力備備了優勢的戰爭經濟能力終於贏了最後的勝利。歷史家評論那一次戰爭勝敗的原因，如僅從政治軍事着眼，顯然是不充分的。至於近代戰爭的武器供給有賴於工業，這已經是週知之事實。各交戰國的戰鬥力，在武器供給上，亦是依賴其本國工業的能力而定。以上三種結果，所謂利濟民生，戰爭經濟力與國防，在每一個工業國家裏都是經過自然長期的演進而成，直到最近的時代爲止。各工業國在這幾方面都從工業得了優厚的收穫，但在以往的時候很少將這幾件結果，懸作目標，當作國策，企圖作有計劃的實現。近幾年來這種情形，顯有變更，有所謂計劃經濟，而一切計劃經濟，必先假定目標之存在。蘇聯的工業在理論上是以解決民生爲目標的，事實上是以國防爲目標；德國自國社黨秉政以後之工業，幾全部是以國防爲目標的。所以這三件在昔日自然演進的結果，今後將成爲各國發展工業可能的目標。中國要建設工業，亦必於此三種目標之中擇定一部或全部。

這三種目標有相互的關係，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如英美等國，在平時人民生活優裕，在戰時武備也雄厚，這是相輔的。但我們必須認清，這種關係不必一定是正面的相輔，相成的，而是會成爲反面的，互相衝突的。在相輔與相衝突的情形之下，要完成一種目標，就會犧牲其他的目標。例如蘇聯的工業，在理論上固然是以民生爲目標，但實際上，蘇聯的工業自給就是國防的工業，至今工業的產品大都爲供給國防上的需要，所給予人民日常生活上的影響實在很少。蘇聯以社會主義的國家，在工業上爲完成國防目標，亦不得不暫時犧牲民生的目標；今日蘇聯的人民廣泛的希望國防需要滿足之後，他們的生活將因工業之發展而提高，但其期望就無把握了。至於德國近年來在國社黨領導之下，普遍限制人民的生活標準，犧牲一切，纔完成了歷史上極大的擴軍計劃，更是有力的證據。在近代的情況之下，一個未開發的國家興辦工業，如果要對於這幾個目標，兼籌並顧，必致造成顯此失彼的

結局；而要達到其一種目標必須在相當時間之內犧牲或抑抑其他目標；這是中國建設工業首先應該注意之事。中國建設工業勢必只能於此三種目標之中選擇一種。不幸實際上中國今日已無選擇的自由；事實與環境的壓迫，中國與爭國家的生存，只有建設國防的工業。

中國工業之路由國防到民生，這是對的；如改爲由民生到國防，這是錯誤的。事實上民生工業與國防工業的區別，不在於工業的設備與工業的本身，而在於支配工業的政策與目標。就工業的設備而言，這兩種工業是相同的，克虜伯，斯科達可以造鎗砲，也一樣可以造農具。按之上次歐戰的經驗，如美國的工業設備，只有百分之三或四是不適宜於從事製造軍備的。設備相同，基本原料相同，但因政策與目標之不同，所以結果與成品不同；從國防工業出來的成品是鎗砲，從民生工業出來的成品是農具。民生工業既然可以改組爲國防工業，國防工業自然一樣可以改組爲民生工業。中國的國防工業一經樹立，將來國防需要滿足之後改組爲民生工業是輕而易舉之事。中國的工業建設先國防而後民生，是基於政治的需要；工業建設在中國，首先是政治的問題。從工業上討論工業，在中國是錯的；從政治上討論工業，就是要決定工業的政策與目標。

從民生與國防的觀點看，中國的工業現在居於怎樣的地位？這是值得嚴加檢討的問題。中國的工業有八十年的歷史，其中的經過多半是艱苦的。因爲種種特殊的原因，其著者如中國居風氣之後，外商之強烈競爭，政府之無保護，科學技術之落後，遂使中國之工業不易建立，已建立者不易維持。在逆流的形勢之下，國人提倡工業之努力值得讚揚，但其成績實至細微無可爲言。軍興以後，中國在西部有若干工業上之措施；即併此而計算在內，中國工業之基礎極爲微薄，能力極爲脆弱，乃一般公認之意見。中國近年號稱有工、三百萬，但在十年以前實際上嚴格的所謂產業工人之數，較百萬稍多，殆較確實。此在全國人口中所佔比例不及百分之一，較之英之百分之七十（工、商，交通），德之百分之六十，美之百分之五十或蘇聯之百分之十，相

去甚遠。若將配合於此等工人之機器，設備，交通工具，技能與知識，資本，原料，及組織，合併計算加以比較，相差更遠。故就平時而言，中國之工業在整個國計民生上所能產生之影響，實屬微乎其微。至於在國防上之能力，中國之工業亦遠不能與其他工業國相提並論。依上次歐戰之經驗，每一士兵在前線作戰，須有十二個工人在後方生產始可以應作戰上之需要。依此標準，中國現在軍額三百萬，若半數在前線作戰，應有產業工人二千萬人，及可擴充以供其工作之機器，資金，原料等等。此等比擬過於牽強，中國工業之能力，在國防上與其他工業國相比，其落後之實際情形亦非此等數字所能充分表現。八十年來提倡工業之結果，就其一般而言，於民生甚少裨益，於國防更乏貢獻，中國近年來之實際情形可資證明。如果進而研究中國工業發展的途徑，我們可以了解此種缺乏實效的情形，由來已久。不盡由於中國所遭遇的特殊環境。

中國工業之發展，歷來是循着三個途徑，一爲純粹私人的立場，二是畸形的發展，三是缺乏整個的政策，目標與計劃；這三件事相關，是互以因果，是同一宇宙觀的三個方面。向來支配中國工業的興衰與其發展方向的是物價，國外的與國內的；這當然是經濟常識與一般工業國的通病。試以紗布工業爲例，在歐戰以前，因爲中國市場之門戶洞開，外商之競爭劇烈，中國廠商從未拾頭。歐戰既起，外貨斷絕，市價高漲，一時華商之紗布工業風起雲湧，進入黃金時代。及至歐戰終了，中國之紗布工業亦因外商之捲土重來與世界之不景氣，而呈迅速之衰落。紗布工業如此，其他各業亦然。中國一種事業之應否興辦或維持，廠商方面從不以國計民生，社會利益，國防需要爲考慮之根據，而僅從商業算盤上之盈虧着眼；政府方面在過去亦從不加指導。工商業之於物價，亦猶農業之於天氣，是無把握的；中國之工業事實上受物價之指導而發展，其不能雄厚健全，乃屬事理之常。中國興辦之事業，凡屬工程稍大，如鐵路，礦山，次之如電燈，自來水，其材料之供給今日依然無一能脫離外商。即中學之理化儀器，如標準稍高，中國廠商即感困難，

大非出貸尤非易事；如果政府爲應教育上之急需從事廠製造，廠商亦必以奪其生計爲口實企圖阻撓。凡此種種爲中國工業薄弱之現象，亦爲循着純粹私人立場之途徑而發展所必有之結果。同一原因所產生之另一現象爲中國工業之極端畸形狀態，其發展之規則，不平均，所謂畸形現象，即依據民生、國防、及技術上之觀點而論，中國之工業應舉者未會舉辦，不必發展者反而發展；亦未有所謂重工業與輕工業之分。一九二九年中國之產業工人分配在十萬人以上者，有棉絲合計約三十萬，鐵工二十萬，電氣十萬，烟草十萬，火柴約十萬；總計全部較一百萬人稍多。在此種分析上，吾人可以注意屬於基本工業者如鋼鐵工業，化學工業之不存；屬於工具者如機器工業之無有，屬於文化有如印刷工業之薄弱，屬於純粹消耗者如烟草工業之發達，在人數上幾佔十之一。即使將屬於外商之資金，設備與工人除開，則與此人數相配合之機器，設備，資金，交通等，在全國之分配上當亦呈類似畸形之比例。此種畸形之變異，無本末亦無輕重。亦爲其他工業國家所未有，故中國之工業缺乏基礎不能自立。試一比較發展正常之工業國家，中國工業地位之危險益顯明。英國一九三三年之產業工人在十萬以上者，有煤礦九十萬，機器工業四十萬，棉毛工業合計六十萬，建築四十萬，印刷工業二十萬，造船十萬；日本一九三四年有紡織工人九十六萬，重工業十八萬，化學工業十九萬，機器工業三十萬人。依此等人數之分析，我們可以約略窺見，在此等工業發展正常之國家，其全國之人力，財力，時間，乃至組織，精神亦是依着類似的比例，平均分配於其工業的各方面。這些國家的工業，基礎穩固，組織堅強，能力雄厚。中國工業之發展，向來是絕對放任的，在小體上稍有成就，在大體上只有失敗。過去政府在消極方面沒有加以保護，在積極方面也沒有指導的政策與計劃。自中山先生草擬之全國實業建設計劃以後，從無一次政府有遠的眼光，大的魄力，以全國爲單位，以民族需要爲目標，針對國家現時之處境，企圖設計一個基本的中國工業建設計劃，更談不上實行。自然，計劃經濟在其他的工業國家是比較晚近之事，他們曾經有過長久的時

間，廣大的機會，良好的環境，得到了自由發展的收穫。但是晚近以來，因爲國際商業與軍備之強烈競爭，計劃經濟的成份在每個工業國裏面，日益增加。中國在這樣危迫的局勢緊壓之下，建設工業，必須加倍警惕於自己過去的慘痛失敗，而成功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有政策與計劃。

中國的工業建設必須是國防建設的一部份，也必須絕對的受國防建設中心綱領的指導與支配。中國工業建設之條件有政治的，有工業的與技術的，二者缺一不可。國防建設的中心綱領，是政治約條件。這個條件決定總談得上工業的與技術的條件，如原料，資金，工人等等。這兩個條件不發生比較輕重的問題，但其關係可以概括的說，中國的工業應該從政治的條件着眼，從工的與技術的條件着手。在國營的事業方面，這些都可以希望少有困難，今後政府在消極方面不致回到以前凌亂舉辦工業的毛病；在積極方面還待表現出這個問題有充分的認識與澈底的決心。最大的困難是在於私人方面。一國興建工業所需的資金，勞力，時間，精神，其主要部份是私人的。國防建設中心綱領所指導與支配的對象，其主要部份也就是屬於私人的物資與人力。關於公私企業之分，中國在過去曾經根據各國的經驗與本國的需要，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事業太大非私人之力所能舉辦的由國家經營之。這個原則曾經中山先生提倡，國民黨著公政綱，並且得到普遍的承認。但與此相聯的一個附則，爲用來支持傳統的絕對放任主張，就是在這個原則之外，私人可以有自由，政府不得干涉或剝奪其專業；否則就要加政府以與民爭利的罪名。這個附則擔拾上一世紀自由主義的餘影，以爲廠商的商業算盤作掩護，未得無條件的承認。相反的，晚近在各工業國家裏面有兩種趨勢日益有力，其一是私人產業不得爲違害社會之事，其二，政府可以強迫私人產業作國家所需要的事，第一種趨勢的本身原來很久，沒有一個國家不多少適用之；但近來漸被普遍的適用於抑制資本家不負責任的行爲，用以解釋法律，裁決糾紛。第二種趨勢更爲澈底，在戰爭時代，最爲顯著。如英國的私人資本向經政府保障其所享之極大自由；但倫敦六月十三日合衆社電稱「據一般入

預算財政顧問之人選下週將有重要之更迭，此舉或將為六月下旬財政令之大改革之先聲，此項改革，包括減低利率及強迫各銀行向重要工業投資以供給其急需之資本。這兩種趨勢與原則並不衝突而是必要的補充，法令上在規定原則的同條文內應該把這兩點意思加入方稱完善。其實中國近年因抗戰的需要已對這原則為重要之補充與修正，如國際貿易從前是私人經營的，現在由政府統制了；日用品如糧食之類從前出私人自由買賣的，現在也由政府統制了。在別國這些都會經過長久的討論，在中國因事實所迫一朝實行；在此處亦如在其他方面，中國享受別國經驗之賜。但缺點是中國行之雖其太晚與不徹底；如戰時利得稅在英國是百分之百，原意明白；在中國是百分之十至五十，不免鼓勵人民發戰爭財。不徹底的毛病就是不生效；與其說是顧全特別的情形，不如說是顧慮傳統的習慣，不肯徹底的打破。依照國防建設中心綱領去建設工業，就必須徹底的糾正私人資本的放任，自私的舊習慣，為達到這個目的，政府備有方法，其形式半強迫，半獎勵均可。中心綱領的作用與目的，概括起來，就是要使全國公私方面的人力，物資，時間，精神，依着指定的方向，循着預定的槽道，匯流貫注到國家急需的事業裏面去；所必須絕對禁止的，就是不依方向，不循槽道，以致分散力量，妨礙政策。照此辦法，以往有許多有利的事業，政府可以禁止或限制私人投資；現在有許多急需的事業，政府可以獎勵或強迫私人投資。有許多事業向來認為是

物價和農村變遷

——一個調查計劃的擬議——

自從抗戰以來，物價問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不過討論的中心多半限於影響物價的若干較大的原則，其中也有一部份人曾指出了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差異。我們現在要提出來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物價上漲以後所發生的物價與經濟的變遷。這一問題似乎還少有人注意到。對日戰爭發生以後

純屬私人範圍的，現在為國防建設的需要，政府應以直接經營；例如小學教科書，向來是書業的基礎，如由政府統籌印售，不但價格可低廉若干倍，其質亦可提高翻一；為貫徹普及教育，政府對此種事業，勢亦不能長此放任。有許多事業如收音機之類在製造方面，向來是絕對自由的，今為國防建設的需要，政府如不自營，亦應劃一製造標準，現定產量與價格。其他大小事例，不勝枚舉。中國之工業建設必須依照中心綱領去發展，總能使其各部門如輕重工業，原料與工具的工業平均發展，今日可以固國防，他日可以利民生。

中國如不淪於莫劫不復的境地，其復興乃至於強大是可以相當迅速的；這不是預言，乃是根據各種因素的客觀判斷與希望。其間有幾件不可少的工作；其中的一件就是國防工業的建設。工業之為近代國家存亡的重要關鍵，在以前大家之泛，現在知道今後將被深刻的認識。凡賽爾和約就戰勝者的立場看，有一個大漏洞，就是未曾取銷德國的工業，德國終於很快的復興了。倫敦七月九日路透電「關於希特勒對法國之最後計劃雖不許洩漏，但法勞工部長包瑪索氏頃已露透，新法蘭西將放棄其過於誇張之工業主義而轉變成農業國家。此項政策即為德國數年來擬施行於巴爾幹者。果爾則法國偉大之工業非突然毀滅即漸趨凋殘」。德國此次根據自己之經驗，顯擬對於法國的命運作一最慘酷，最徹底與最後的安排。吾人觀於此種事實，應該知所警惕與努力了。

樂由武漢大學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

趙晚屏

物價普遍地起了極大的變化。各種商品的價格雖一般上漲，可是變化的程度不一樣，變化的可能也是不一樣。這種價格變化的差異形，在經濟上會影響商品生產的相互關係和工業發展的趨向，在社會上會影響個人財富的分配和社會階層的轉移，有的工業因產品的價格高漲而發展起來，有的工業却因原料價格飛漲和銷路停滯而失敗，這裏面所發生的微妙的變化對工業的進

伏，能使我們的經濟機構起極大的變遷，個人的收買也直接和間接受價格變動的影響，一般的收入雖都有增加，可是增加的速度各人不同，還意義是復重大的。有的人發了國難財，轉瞬間由窮措大變成了富翁，有的人收入的數量雖未減少可是購買的能力却因物價高漲而衰落了，於是社會的階層之間不免發生了地位的對流。

研究物價和一般社會變遷和經濟變遷的時候所包含的問題十分複雜，研究物價和農村變遷的關係比較簡單一點，可是牠底重要性却並沒有因此而減輕，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變化應該最得我們去注意和研究，所以我認爲我們要研究物價和社會經濟變遷的關係，應先從農村變遷做起。在影響今日農村生活的諸因素中，物價是最主要和普遍的一事了。作者此次會跑了廣西省和雲南省若干縣的鄉村，發覺農村在這一物價空前巨變的漩渦之外恬靜地隱伏着，看不出什麼顯著的變遷。這種安定是表面的呢還是實在的呢？是暫時的呢還是持久的呢？中國的農村並沒有脫離他和都市的經濟關係而完全在孤立中生存。那麼都市物價高漲的影響決不能不刺透它，如此，農村所受的影響在那裏呢？那一些是變化了或正在變着？那一些是並沒有受影響的？如果變了，變到如何程度了呢？

我們可以把這一個問題的研究分成三個主要的部份，第一是農村社會生活的變遷，第二是農村經濟生活的變遷，第三是農村與都市關係的變遷。

我們先就物價對農村社會生活的影響來說吧！這種影響有的是直接的，如家庭預算表上數字的變動，有的是間接的，如疾病率的增減，最先受影響而且影響最顯著的是農家的家庭收支，據我們所知道的，農家的收入增加了。可是，那一種農民的收入增加最多，是地主還是佃農？平均每一農家所增加的收入是多少？收入增加的主要來源是什麼？

祇是收入並不足以表示農民的家庭經濟狀況的全體，我們還得調查他們支出的項目和費用，有那些項目是新的？有那些項目取消了？支出的總數是否增加？各種項目在總支出數中所佔的比例有沒有變更？這一個收支的情形便表示了農民應付當前變化的戰略，物價漲了以後，一方面固然增加了他底收入，一方面也增加了他底開支。這兩種增加是不相等的，這相差異對他實在又是不利的。據作者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農民一般地現在都較從前富

裕，這一個富裕大多並不是由於收入的增多而是由於支出項目的減少。有許多東西，農民本來要由都市購入的，如洋紗，煤油，現在都因價格太高而省略了或是減少消費，如果農民要保持他原來的消費，恐怕他不出多不了錢，也許還要開闢空呢！因爲農民現在收入的增加並不是由於農作技術的改良或耕作面積的擴大，而是由於農產物價格的上漲，可是農產物價格上漲的利潤還不如工業品，同時，因中商人的操縱，農民又不能完全吸取農產物價格上漲的利益。那麼農民是否犧牲了他現實的享受而只求目前空虛的富裕？

農民多了錢以後對他有什么實際的利潤呢？普通，農家有了錢便要轉念頭娶一房媳婦了。那麼農村的婚姻似乎會提高，婚姻率提高了，生育率無疑地也會跟着提高，農民的生活好過了，對生育的恐懼會減少，墮胎的必要也沒有了，這些都是刺激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在另一方面農民的衛生設備是否也有了改進？如果衛生環境改良了，死亡率一定要比往年低，據我們在各地研究的結果，發見收入的多少和死亡率總是成反比的。這樣，一方面生育的數量增加了，一方面而死亡的數量減低了，我們一定會眼看農村人口的大量增多，這種變遷是否存在着？如果是真實的，牠底影響一定是深刻的，而且是永久的。

除了人口數量以外，農民的生活是否因收入增多而改善了呢？這和農民的福利很有關係，我們可以比較一下，農家在最近購置的新衣和布料是否較往年多？農民現在是否大量地興築新的房屋或修葺舊的茅廬？食料的數量和品質是否有增添和改進？兒童入學的數目是否比往年多，這些都是和健康及生活的享受有關的，如果上述的問題不能求得正面的答案，那麼所謂農村繁榮只是一個虛幻的影子，農民實際上沒有得到好處。作者在各地所見到的，都使他誠生那麼一個印象。

農民既然沒有把他們底錢用來改良生活現狀，他們是否把那些錢用來改良他們底生產方法，以博得將來更多的錢呢？關於經濟生活一方面自然也受着兩重的影響，一種是資力的增加，一種是物價的刺激，我們不妨研究一下，農作物的種類是否因價格的差異而有了變化？那幾種作物的面積增加了？那幾種作物是新介紹進來的？那幾種作物是在逐漸減少或是完全衰落了？這種作物的消長會引起農作制度的極大的變革的。十八世紀末葉，英國的農村因爲新加入了蘿藤和種植，農田不必休閑，而農家飼豬也不患無食料，使棉

亞瑟 Arthur Young 在他底旅行日記上十分感嘆這一轉變對農作制度的影響。

農場經營也是受物價變動和收入增加的影響的，農民的收入固然多了，物價却同時漲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如何設法平衡他心目中的農場經營的預算收支呢？農具的應用是否增加？新式的農具是否因資力的增加而被應用？農民是否把他們底錢投資到第二房媳婦「耕牛」上去？肥料的施用是否加多了？或是農民設法改用其他較優良的肥料？農民會否化一些錢來修築築壩，改良他底田畝！如果他不要把錢投資在這些上面，我們所見到或聽到的農民囤積的現象是否正確！已經做到什麼地步！這一點要能證實，那麼我們可以發見一件新的事實，便是農民現在已經放棄了他傳統的正常的投資而開始投機的生意了，從農民開始下種到收成後去運銷為止，這整個農場經營所包括的會計項目都和物價發生密切關係，農民的是否能有贏餘便要看他是否能有力量來安排這一大堆的數字，因此，農場經營的會計項目的變化也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我們可以從此窺見農村經濟變遷的情形和意義。此外，個人的耕地面積是否也有了變動，耕地的總面積有沒有增加！這些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我們在上面會提到作物面積的變遷，作物面積的變遷是以作物價格為標準的，因此，我們要研究各種主要作物的價格變動的情形。那幾種作物的價格漲得最快或最慢，農民採取什麼方式來適應這個新的價格環境？像其他工業家一樣農民的成敗也是繫於價格的變化和他適應的技巧的，農場的工資是否發生同樣上漲的趨勢？長工和短工是不是一樣享受著工資上漲的優惠？如果短工的工資漲得快，那麼以後田場上將再難找求長工，因而農場的勞動將會流動化，失去過去的穩定性。這一個變化的意義和重要性只有實際經營農作的農民纔會體驗得出來的，同樣或更重要的是田地價格的變動，田地永遠對農民發生一種神秘的力量的，農民辛勤一世，真正滿足的時候是他購置一方自有的田地的時候。現在農民有了些小本錢了，每一個農民都變成後備的田地買主了，這一個願望能否滿足要看客觀的條件是否允許，換言之田地的價格上漲的程度是否超出了農民購買的能力？最近田地買賣是否多？買的又是那些人？賣的又是那些人？事實上操作者所得的觀察的印象，田地的買賣並不多，換言之，農民並不能利用他們積餘的錢來購置田地，以改進他們底

地位，使以往的佃農變成未來的自耕農，田地和耕牛的價格都漲了，工資也太高了，這並不是農民投資田地最理想的時候，可是，消極地，至少，農民却正利用了這一個機會在防止租佃關係的惡化，這便是因債權關係的變化而造成的結果。

農民的收入增多了，手頭寬裕了，如果他們是負着債的話，他們便可以餘錢來償債了，事實上，農民乘這一個「便宜錢 - Cheap Money」的機會來了却債務的實在不少，這是他們最切身的痛苦，農民擺脫了債務的羈絆，被迫賣地鬻子的慘劇也不會有了。農民的債務多半以典押田地的方式借成的，田地的典押再加高利貸的圈套往往便是農民出賣田地的第一步。租佃制度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深刻化起來的。農民借債所付的往往是穀，在穀價高漲的今日，多麼不合算！無論如何一個忠誠的農民總希望早一天把債務償清的，所以租佃制度的惡化現在似乎受着限制了。

最後，我們可以研究物價變動之後農村與都市關係的改變，農村和都市的關係向來是相當固定的，在人口一方面，農村總是一個債權者，它不斷供給都市必要的人工和各種不同的人，在經濟一方面，自從工業用品侵入農村以後，它常常是債務人，它供給都市的和立取之於都市的常常難以平衡，農村的資金源源流入都市，農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衰落。現在是否有任何現象可以使我們相信像這樣的情形正在改變？

都市的人工比以前值錢，工資飛一般地漲着，農村的人工是否受着刺激而大量的移向都市？移出的程度是否已到了足以危害農村自存的地步？這種移出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移出的人工是那一種人，男的或是女的多？年青的或是壯年的多？這一個移動如果十分顯著，那麼不久以後會大大地改變都市和農村的社會結構和人口組成的，所以我們不能不研究。

據作者在各地觀察時所得的印象，農村都賺了錢，這些錢都是從都市賺來的，如果我們底觀察沒有錯誤，那麼可以見得農村和都市的債務關係是在改了，這是歷史上一個極重要的變遷，這變遷究竟是由於農產物出售的價值增加的緣故呢？還是由於農民限制都市商品消費的緣故呢？如果是前者，那麼農村的繁榮是實在的，如果是後者，那麼農村是犧牲了它底現實的享文，減低了生活程度來造成這一個新的債務關係的，這一個債務關係的變遷我們只有在分析農民的底預算和農戶經營的收支項目後纔能發見。

農村向來是消納都市工業品的大市場。現在農村節約了，她限制了都市工業品的消費，無疑地，都市的工業生產受嚴重的打擊，不過這一個變化是暫時的，農民是睜著尖銳的目光隨時注視着物價的變動的，只要物價一低落下去，農村逐漸累積起來的購買力恐怕會變成今後都市工業發展的最大刺激吧；不過，最近的發展是否表示農村有重新走到自給自足的趨勢呢？

對於各級農業教育之管見

會省

吾國興辦農業學校，以之培養農業技術人才，與推廣農事，垂四五十年，而著效殊微，何也？推原其故，不一而足，建設不能合作，各級教育機關不能取得聯絡，而謀工作之貫通，同時各種學校與研究試驗場所，又未能完全認清目標，進行有效而切於實際之工作，遂致耗財費時而無功。際此長期抗戰農林生產事業之改進，關於國家強弱與民族生存甚切，茲特就吾國各級農業教育過去辦理之缺點，略述一二，區區愚見或可供採擇焉。

現行農業教育制度分為三級，即（一）高等之大學農學院與專科學校，（二）中等之農業職業學校與鄉村師範學校，（三）初級之鄉村小學（中心學校與國民學校）是也。若此三級農業教育機關能上下互通聲氣，事業彼此有密切之聯絡，則各省或各區域內關於農林事業之改進，無論研究教學，推廣，及鄉村建設工作，皆可由農業學負責推行，或協助推動，固庸於原有學校系統之外，另設研枝機關，虛耗經費，徒見其害而不容其利也。所謂科學研究與訓練技術專門人才，本為大學農學院及專科學校之責；培養鄉村學校師資與造就中下級技術人才，亦屬學校事業範圍；即現時農業建設機關。所提倡之農業推廣，介紹農民新式技術，本「教民稼穡之義」，亦不離教育之途徑。美國一州之農業改進，全出一州之最高農業教育機關負責，而農事試驗場則歸農學院主持，以是研究，教學，推廣集於一體，自然運用靈敏，而見效迅速。反觀吾國各級農業教育，向無一貫之政策，加之科學研究則未臻上乘，技術訓練往往不適於實用，推廣有時則專事宣傳，與僅求數目字之表現，以是農業無進步，鄉村建設難見成效，欲謀吾國農業之改進，以期增加生產，適應長期抗戰，宜認清教育是經濟與武力相聯繫之樞紐，必須以發展經濟，增強武力，為我教育之方針，且余嘗曰：「鄉村建設宜立鄉村經濟之軸心（改進農業與提倡鄉村工業）然後吸引農民組織之（政治）訓練之（教育）此即是新農業教育之要義，與建設鄉村之新途徑。教育不與經濟相背馳，又組織民眾斷不能無經濟之基礎，策動成功也。

現在某省或某專業區域內，大學農學院之外，又有所謂農業改進所。據者雖屬於農業建設機械之性質，辦理農業推廣工作，然有時為其工作進行便利起見，必須訓練其推廣人員；同時為求推廣工作早見實效，又不能不假研

我現在都嗜着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等時髦的名詞，對於這些活的事實的變化我們能漠然不顧嗎？抗戰以來，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生活都有了極大的變化，我們對於現實應該有一個新的認識和新的觀念，作者認為政府機關和學術團體應該起來做找求「活事實」和「新真理」的努力，這便是做一個相當廣泛的社會和經濟的調查。

究試驗等工作，由此重點觀之，農業改進所實兼辦研究教學推廣三事，與大學農學院及農林專科學校所進行之事業固無二致。一省或農業區域內，既有此二同性質之機關，即引起人才金錢之浪費與工作衝突重複之弊比比皆是，故急由中央與地方政府，教育部與農林部從速商議調整辦法，將農業改進所併入大學農學院，仿美國農科大學之先例，由農學院兼辦全省農業改進事宜。農學院最好改為獨立學院，免受大學行政之影響，致礙農業改進事宜之推行。經費則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分籌之。或者於人才設備未周之省份，將大學農學院或專科學校併入農改所，或做江西農業院之先例，擬設農業院，除辦理推廣農事改良之外，兼負訓練農業技術幹部人才之責，俟人才集中，事業發展，設備充實，教育部允農業院擴充改為農學院，得訓練高級專門技術人才。按目前情形而論，各省農業改進所事業頗發達，已操全省農業建設之樞紐，經費充裕，有每年多至數百萬者；而大學農學院除閉門教書外，幾對外無事可為，有則與農改所事業相抵牾，而經費奇絀與農改所較，真有天淵之別，此事教育行政當局不可不特為注意也。

中等農業教育包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應改組稱鄉村中學）鄉村師範學校（應併入鄉村中學內）與初級農業職業學校（此應併入中心學校或改為農民補習學校）初級農業職業學校本不遠於我國農村情形，除少數有特殊情形者外，當以不辦為是，欲訓練農民以農業新智識，年長者則為之多設各種農業短期訓練班或講習會，青年農民教育則由鄉村小學任之，故將來各鄉之中心學校與各保之國民學校，擴大其組織，充實其內容，使適合於鄉村建設之需要，而農業課程與田間工作不能不加重，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是養成農業實地經營人才，與下級幹部農業技術輔助人才，及鄉村工作指導人員，與大學農學院及現時之農業改進所及其他鄉村機關之工作應取得密切之聯繫，免致閉門造車，出而不能合轍，或有上不能協助技術研究，下不能深入鄉村從事田間工作之缺陷。鄉村師範學校為將來各鄉村小學師資培植之園地，對於農事與鄉建智識非加以完善充分之訓練不為功。

教育系統既定，目標既明，邁進而檢討過去各級教育之措施而言其缺點：

第一大學農學院 大學教育之目的為一方研究高深學問，一方培養專門技術人才，然祇限於此二者，則往往辦學閉門教書之政策，學校與社會隔絕，而技術又不適於實用，故有一農業是農業，農學是農學之譏。一大學農學院既負改進全省或某區域農業之責，而農業改進與鄉村建設之各種計劃頗有關係，無不與鄉村事業未進步，而農業可得發展者，故大學農學院對於鄉村社會問題，如政治、經濟、教育皆不能不加深切注意與研究。而今之辦農學院者，往往側重於自然科學方法之傳授，而缺乏社會科學之訓練，此種狹窄之訓練，施之於二十年或五十年後之中國農村或認為恰當，而欲培養今日之青年，使負建設鄉村，復興農業之全面工作，似嫌力有未逮。或謂關於農村社會方面工作，可由法學院學生任之，固無庸農學院學生為之，殊不知中國鄉村社會素以農業為主體，農民佔重要地位，若一切建設事業不先與農業發生關係，則農民不感興趣，推行困難。故前而會言於鄉村間進行建設工作，宜先立經濟之軸心，吸引農民組織之，訓練之，然後各事業始有永久堅固之基礎；否則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曇花一現之鄉村建設則隨政治人物而轉移，固屢見不鮮矣。既以農事為前提，若命未受農事訓練之學生任之，亦覺隔閡不道，此固由事實所得之教訓而立論，非空憑玄想者也。故大學農學院之教育，宜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部分，換言之，則平時研究與教學對於農事之改良與鄉村建設二者不可偏廢，而學生之訓練亦宜廣而不狹，因現在農學院畢業後治專門研究與擔任專門工作之屬少數。常與農學院畢業生在社會服務者談，不感學非所用，則感力有未逮，前者之例為在校時本習園藝或森林畢業後以機會關係不能不改就蠶桑或畜牧之事；後者是指畢業生在校時僅受技術上之訓練，然畢業後或須擔任鄉村政治或推行合作事業，若不於平時予以較廣泛之訓練，則有農村工作而農學生反不能勝任之怪事發生。以上所言全是事實，且是中國鄉村社會落後之環境所成特殊景象，并非不承認各門學術各其獨立性而主張打破科學本身之界限，遷就吾國社會之環境。現在教育部所規定農學院之分系辦法，因為學校自有其不同歷史之背景與現實之特長處，不必統為更改徒滋分擾，仍照教育部所規定者，設系訓練學生；不然如屬新成立之農學院或專科學校，設於交通不便之處，經濟不甚充足而人才設備未周，可簡設(一)農業技術系(二)農業經濟系(三)鄉村政治系(四)鄉村教育系以代之。農業技術系(二)數方針對培養專門技術人員；鄉村政治系(四)是培養農業合作人員與鄉村自治人員；鄉村教育系(三)是培養鄉村教師。能如是，則無前者之某項狹窄，而有適應環境，合於中國鄉村需要之長處，法固善也。

農學院除以各種功課訓練學生之外，同時宜注意研究與推廣，為因農業改良常受天時地域之限制，且社會組織與經濟情形之不同亦與焉；故一國有一國之農林，一省有一省之農業，決非抄襲雷同，得而解決也。以是我國農業社會所當解決之問題，當由當地農學院負責研究，設法解決，以之推廣及於農民，故萬不可于改良農業及增加生產，以利建國抗戰之時，政府忽改變方針，授意農業機關，停止研究而僅辦推廣。說者謂吾國研究工作，素少效率，與其曠日持久勞而無功，毋寧於北國家經濟拮据之際，於此下急之務

，言之或可動聽，其實此種過去事實。是由於政府管理散漫，與專家能力薄弱，及環境惡劣所致。參閱今日評論第二卷第廿一期通信(一)非學農者不能研究，而農業推廣者不須先有研究也。欲若國辦理農學院真能盡其能，其效能，足以解決農業問題與建設鄉村，須依左列辦法，加以整理，既可節省經費，復能配合力，使步伐整齊，共趨於一途，功效必著，若祇言推廣，欲求速效，恐終等於緣木而求魚也。

一、一省或集合數省，依天然環境所劃分之農業區域內，得設獨立之農學院一所，并充實其內容，與提高其學術研究之地位，使能負研究農學，真能解決農業問題之責。

二、已有數省農業機關之省份，應由中央政府令其合併，設一農學院，容納各方專門人才，并健全其組織同負研究教學與推廣之責，原有經費統籌保留，凡屬省政府建設經費，統撥歸農學院作補助研究及辦理農業推廣之需。

三、所有省立中等農業學校及鄉村小學，統由農學院任指導之責，教育廳僅處於監督行政之地位。

四、農學院除設應有各系外(簡式，複式，參閱附圖)得添設教導，研究，推廣三部分理其事。

五、農學院內應設農業改進設計委員會，由農學院院長及省政府各廳長組織之，如是始能解決建設問題而求其實現。

第二中等農業學校 中等農業學校之目的，照教育部規定，為養成自身經營各項農業之人才，農場技術員，農業指導員，農業推廣，農業合作，農村改良等合法人員及小學農科教師，果爾，則此等學校內部可劃分為(一)農事，(二)村治及(三)教育三組，養成學生適於現時吾國鄉村建設之需要，而不必如大學依科學專門類而分為農藝、園藝、森林等系，減却普通之訓練，而察農學生畢業後之出路。據各方觀察之事實及經營農場之經驗，在中國農村辦理農場還以多角經營始可獲利，能如是則地利與人事可盡利用，而經營又易于周轉，故余曾主張至鄉間工作人員，當注重實用技術與常識之訓練，不宜以訓練大學農學院學生之辦法，施之於中等農校學生，專科以上學校有專門學科之研究與專門技術之應用，降至鄉間事業，本極龐雜，決非僅受專門知識之學生可以應付一切問題，故中等農校訓練學生絕對不能取細狹方式，而尚多面的實際工作，故將此種學校內容分為三組即此故也。又此種學校係為改造鄉村而設，自宜位於鄉村環境中，命之曰鄉村中學校而將以前各處所辦之專講教育不重農事，不適於鄉村所需要之鄉村師範併於其內，既省經費，而又能於生長環境中產生合於鄉村所需要之健全鄉村小學教師中等農業學校，上承農學院，下啟鄉村小學，在農業教育與鄉村建設事業中佔重要地位，惜教學不得其法，成效少著，今將教育方面應革之點簡略述之如下：

一、中等學校教學方針，宜注意當地農業實之需要，對功課之分宜視學校性質，不同而略與變通，凡不適於當地農業所需之課程，可酌量減少或廢除，故教育部所定之課程標準，宜保留極大之伸縮性。

二、教材之採取，須適合於當地農業情形，且編製之次序，更須合於時令季節，為求此項計劃之實現，教員宜具有相當學識，經驗，而敏捷之思

...隨時地留置教材，向學生講解。同時與當地之農事研究，推廣機械切實聯絡，其須請教或借重於當地老農老圃，使得有實用之材料，并傳習其經驗，而決定研究改良之途徑。

三、學校作業宜以田間工作與實際設計為中心，不可側重課本與室內工作。每就農事之需要調移課堂上課地點，集中師生之時間與精力，完成某項農事，養成學生自給自足之整個觀念，與對於農事負責之習慣。

四、農業學校學生田間實習，尚居被動地位，教者既無系統合於實用之設計，學校又無獎勵辦法，而學生所得智識與技術，全是零星斷片致日後毫無應付全場環境之能力，與通盤籌算之經驗，平時既覺興趣索然，因循之習，草率了事，在所不免。業後對於農事經營，與操作又是茫然。為矯此種積習計，對學生農場實習，學校宜採行一分田包工一與一用成本會計方式記賬一制，并組織生產合作社，與規定獎勵辦法，此法余曾在成都四川省立高級農藝校行之，（當時作者兼任該校校長）頗著成效，茲限於篇幅，姑不贅述。

第三、鄉村小學，此種學校係指最近國府明令公佈之各級組織綱要，內所列之鄉（鎮）中心學校與保國民學校而言。此種學校是國家之基礎教育，與鄉村建設事業，推動之中心，負鄉村間教育普及之責任，宜內分兒童，成人，婦女，三部，除注意文字教育與農業技術之外，并有政治時事訓練，軍事訓練，與家事管理，及鄉村工業等功課。教員除善於文字教育之外，應具備鄉村生活所需要之技能，且有文武兼備之學識。此種學校除灌輸農人以智識之外，并創辦集體生業農場或合作農場，立鄉村間經濟之中心，以示農事改良之模範，同時協助鄉公所保辦公處進行一切農事之舉，且對政府命令之推行，取得密切聯絡，如戰時之宣傳，兵役之倡導，新生活運動，及民約之實施等，皆有學校之師生參加工作。

至於農業推廣工作，無論農學院或農業改進所，所有研究改良農事之結果，應交鄉村小學負責進行，如遇有訓練技術之必要，可召集鄉村小學之師

香港的文藝界

（香港通訊）

離世治來說，香港是一個中國城市。這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國人。而這個城市的繁榮，也是中國人造成的。但提起文化，這兒是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性的一華民一讀不通英文，但似乎也讀不通中文。香港街上處處豎有一塊牌子，上面寫着一如要停車，乃可在此。這是典型的香港中文。但香港並不是沒有學校，只說最高的教育機關，就有富麗的大學一所。裏面的教授皆由重金聘來，其薪水最低的每月也有八百元港幣，折合法幣可以抵國內一個初級中學半年的經常費用。上面舉的一句怪文，乃出自香港政府內一華員之手筆，而這些官吏大多數正從那間大學畢業出來的。高材生。

這類有識份子對於英國文化，不會感到門徑；對於中國學問，亦未嘗入室，遑論從事文化工作？是以當地許多漢文報紙，還得由過去的中通遺老們主持。因之一般類似文藝性質的副刊，也就離奇古怪。較好則登載一些

生予以短期訓練，使四鄉就近教導農民，則覺事半功倍，且無杆格不通之弊，固無須另設機關，外求人員，徒費金錢精力而無功也。

余向主張以鄉村小學推廣農業基層工作之責，蓋有二故焉：然今之辦理農業推廣者，每忽於此，茲再申言之以實吾說：鄉村小學是教育農民子弟之學校，鄉中人對其子弟之教師向極崇敬，對優良教師之言語最能重視，且與教師常處於一隅，易與教師接近，受其感化；此外鄉人對學校向不具備可與反對之態度，以其不嫌俯就或收繳機，對農民有所掠取也。從此數點可證明學校推廣農業推廣，在鄉村間是佔優越之地位，即另有機關派員到鄉間工作，斷不若小學之普遍，與小學教員力量之雄厚，若小學教員訓練得法，替政府推行建設工作，為農事機關推廣農業，效率之速，等不置郵而傳命。

現在鄉村間所需人才，以鄉村小學教師為最適宜，專家以研究所得之結果，是也。訓練下級人才，以鄉村小學教師為最適宜，專家以研究所得之結果，是也。訓練下級人才，以鄉村小學教師為最適宜，專家以研究所得之結果，是也。

付諸鄉村小學學生即農民子弟，能實地去做經營農業，遇困難時，必請教於其教師，教師無法解決，乃送材料至高級研究機關研究，以是大學與小學打成一片，農學與農業治于一爐。大學農學院等於人體中樞神經，鄉村小學好比比側神經，鄉村小學學生則是人體中之運動與感覺器官，須有密切之聯絡，配備齊全，然後有機體各部呼應靈敏，分工合作，運用始能發效力，農業改進及農村建設與鄉村小學之關係有如是之使指，不可分割也。

結論

一、現在大學農學院與農業改進所，性質近似，工作重複，責任與界限不清，應由中央命令彼此合併，以一機關負責三省或數省農業改進之責，藉此節省經費，集中人力，而研究，教學，推廣三方面工作由一機關負責，自然運用得當。

二、於鄉村間設鄉村中學培養下級幹部農業改良，農村建設人員，及鄉村小學教師，須將鄉村範圍併入鄉村中學內。

三、農事改進，鄉村建設之推動，應由中心學校與國民學校負責，無須另設機關，另派人員，致多窒礙。

馬耳

山伯復視英台書一類的東西。在舊文學方面說起來，抑揚頓挫，不能說無可取之處。較壞的便簡直是胡鬧：上至劍俠俠客，下至一麻雀經一，一懸變經一，等無所不來。

如果說香港有文壇，那就是抗戰發生後由國內遷移去一批文化人所造成的文壇。

抗戰發生以後，國內有許多報紙，香港出版。最著的大公報，申報（後遷上海），星島日報，珠江日報，大眾日報，民國日報等。同時因香港報紙便利，有許多在國內發行的雜誌，也遷往印刷，甚至於有許多書店也在香港印行。因之有許多雜誌，書籍或書店編輯留住香港，再遷去或新辦的報紙，差不多都有文藝副刊。而這些副刊編輯者，都是以前在國內從事文藝工作的人。這些刊物也多有文藝界當然開起來。

因之這些刊物還相當地保存中國新文藝的傳統。中國是正在抗戰，中國人是在

